

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

罗纳德·斯凯尔顿

背景

近年,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在全球随处可见,尽管人口迁徙在亚洲并非什么新奇现象。可是,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亚洲”从东地中海延伸到太平洋西岸,对这个如此广袤而多样的地区,应如何概括其共同特征和问题呢?我曾经提出过一种有关移民区域的分析框架,以系统地说明全球和地区范围人口迁移的各种情况(Skeldon, 1997)。这篇短文仅勾勒亚太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考察其基本的因果关系,并思考人口迁移的最新类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西亚(或中东国家)不列入亚太地区,中亚则将在本期另篇文章中主要放在独联体国家(CIS)范畴考察。

亚洲地区的人口流动古已有之。印度人向东迁徙,中国人移民南下,均发生在东南亚各民族的形成时期。中亚人向西和向东的移动从13世纪起撼动了欧洲和中国社会的基础,建立了有史以来地域最广阔的帝国之一。对于那些把人口特别是劳力看得比疆土更重要的国家,以掠取奴隶为形式的劳力输入成了其份内之事。那些引

人遐想的吴哥寺浮雕,为东南亚社会在20世纪初叶的强制移民现象提供了沉默的证言。

主要从19世纪起,欧洲的各海上帝国向亚洲扩张,引发了新的移民形式。自1808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在各欧洲帝国产生了极大的连带效应。但殖民活动总需

要劳力,北美和澳洲又劳力短缺,由此亚洲人主要是印度人和中国人被招募来作为劳力移民填补空缺。这些签约奴仆基本上是男性,被纳入一种“新的奴隶制”(Tinker, 1974),他们背井离乡时以为还能重返故里,但许多事实上在海外落地生根,或者客死他乡。这些19—20世纪初的移民对于理解今天人口流动的意义在于:印度人和中国人由此建立了遍布全球

罗纳德·斯凯尔顿(Ronald Skeldon)是英国法尔默苏塞克斯大学亚非研究院教授研究员,曾在曼谷做独立顾问,主要为国际机构提供咨询,多年供职香港大学,现在仍是该校的名誉教授。他有关移民问题的著述颇丰,最近的《移民与发展:全球视野》一书于1997年出版。Email: rskeldon@hkucc.hk

的社群网络。永久性的亚洲人社群破天荒地出现在东非和南非,遍及南北美洲、加勒比海和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对岸的东南亚当地。当中国移民数量增长之时,从19世纪后期开始,通过各种排斥法案,他们日益受到北美和澳大利亚强势族群的阻拦。人口继续不断地流向英帝国所属各地,但随着1930年代的萧条和殖民地民族主义

的觉醒,来自亚洲的跨国移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趋于沉寂。但在随后的50年里,来自亚洲的人口迁移再度兴起,他们作为一股力量使源出国和目标国的社会都发生了变化。

因此在亚洲内部或出自亚洲的人口迁移源远流长。可是,当前移民潮的政治、经济和人口背景与以往截然不同。也许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目前的一切发生在那些独立国家的固定疆域内部或国与国之间,其中许多国家是在后殖民时代刚刚建立的。于是,人口迁移波及的国家日益增多就成了当前跨国移民的一个重要维度,同时国内流动与跨国迁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只是尚未引起重视。

各种各样的迁徙

亚太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同样,在人口迁移的方式、数量和类型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亚洲有一些最发达的经济体,甚至在始于1997年7月的危机之后,它们仍居于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列。例如,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已成为吸引亚洲其余地区甚至更大范围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亚洲也是世界上一些最穷民族的家园,并且,在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不是为寻求经济改善,而是逃亡和避难成了人口迁徙的主要形式。1997年初,有大约320万难民从阿富汗逃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因此,这里有人口输入地区和人口输出地区,但也有既输入又输出的地区,如泰国和马来西亚半岛。这些国家的打工仔到更发达的地区去寻找机会,而来自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的移民则到此来谋求在故国无法找到的工作。

移民的种类五花八门,从那些离开亚洲本国赴别国成为永久居民的人,到那些

进入亚洲国家以填补空缺岗位的人,这些岗位从高技术或专业职位到当地亚洲工人也不愿干的低技术工种,应有尽有。也有签合同到海外目标国打工的移民,到本地区或地区外目标国留学的学生,寻求避难者,因生态环境原因迁居的人,以及越来越多已在别国工作大半生如今告老还乡的移民和退休人员。在这几类人当中,情况更复杂的是:只有一部分移民是合法的,而且亚洲各地所占的份额极不相同。在经常被称为“无证”移民的非法移民中,有些是自愿的,另一些人则在不知情或强迫状态下被贩卖。在这方面,弱势群体——主要是儿童和年轻女子——一向受到特别关注。

近几十年,出自亚洲国家的移民与日俱增。1990年代初,亚洲人占加拿大入境移民的一半以上,占美国的 $1/3-4/5$,占澳大利亚的 $1/2-4/5$ 。当时一年进入上述三国的亚洲移民达50万。中国人和印度人由于基数庞大,其移民数量在亚洲的跨国移民潮中独占鳌头。1990年前后,生活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之外的华人估计有3000万^①。统计海外印度人比较困难,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早期约有1000万到2000万^②。显然,这些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后代有许多不是移民,而是出生在海外。可是,最关键的是海外亚洲人社群规模的发展,这是移民数量剧增的重要意义所在。1980年到1990年间海外华人增长了40%以上,从2200万左右增长到3070万。据保守估计,海外南亚人在1970年代初以后的20年翻了一倍,从500万左右增长到1000万。仅在美国,亚裔人口从1980年到1990年间便增加了一倍,从350万上升到730万(Daniels in Brown and Foot, 1994, 95)。

尽管数量增长了,但出自亚洲的移民仍只占其源出国总人口的一小部分。按人

均计算,亚洲出去的移民根本不能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欧洲的人口外流相提并论。但这个结论容易使人误解。移民的重要性和影响不能只根据其基数判断。为数寥寥的富裕移民的经济影响是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亚洲的跨国移民仅出自整个大陆屈指可数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的人口外流真是如火如荼。例如,印度的许多移民出自最南端的喀拉拉邦;巴基斯坦的移民90%以上去英国,主要出自自由克什米尔的米尔普尔区(Ballard, 1987, 24);孟加拉国的移民也大约有95%去英国,主要出自该国东北部的锡尔赫特地区(Gardner, 1995);中国出自广东、福建和浙江三省的移民占了这个巨大国家移民的大多数。甚至在这些地方,即喀拉拉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上述地区以及中国的上述省份,移民也只是出自更小的几个地方。所以,关键问题在于亚洲外流移民的出发地是否会扩展,其跨国移民的比例是否将体现源出国的人口规模。

移民方式的多样性在太平洋各岛国引人瞩目。尽管与亚洲庞大的人口相比微不足道,但对许多岛国,移民问题仍举足轻重。1991年,萨摩亚、汤加和库克群岛本地出生的人口中,分别只有50%、58%和32%实际生活在本岛(Rallu et al., 1997, 84)。可是,太平洋各地的情况仍有很大差别:在美拉尼西亚人的岛国中,较大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很少参与跨国流动,而西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却大批前往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东北太平洋的居民和密克罗尼西亚人则迁往美国。

像亚太移民这样复杂的课题很难一概而论或纳入统一的框架。然而,尽管千差万别,仍可归纳出产生移民现象的几种共同模式。正如遍及亚洲的各源出地与海外

目标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样,通过作为全球化进程之组成部分的移民活动,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各地方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下面就此一考察。

亚洲移民的原因

在影响亚洲移民的所有原因里,有四种也许可以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两种主要是地区以外的原因,两种是地区内部的原因。这四种原因可归结如下:各主要移民社会入境政策的调整;中东石油输出国的发展;外部强权介入亚洲事务;以及亚洲自身的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全球范围的交通技术进步的背景之下并受到其推动,而这种进步是最近50年,特别是1970年以后为商务往来而采用宽体喷气飞机以来才发生的。

主要移民社会入境政策的调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各主要移民社会的带种族主义倾向的入境政策开始逐步废除。这些政策显然不见容于已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建立了联合国的自由民主体制的意识形态,当然,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战后的欧洲迅速发展,美国在原先的“生育高峰”之后出生率持续下降,与此同时横跨大西洋的移民逐渐减少。渥太华1962年1月提出的《移民调节法》以及美国1965年10月1日的《移民与民族事务法案》,有效地为非欧洲族裔的入境者打开了进入加拿大和美国的大门。澳大利亚于1973年放弃了“白色澳大利亚”的政策,最后一个移民社会新西兰则于1978年放宽了政策。于是,包括亚洲人在内的人口以移民身份自由进入这些社会,如上所述,其数量日益增大。移民入境之所以有助于当地社会,不仅是由于其数量,而且还因为许

多人尤其是印度移民和中国移民受过高等教育,同时/或者把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带到他们定居的社会中来。

中东的发展

自1973年的石油价格上涨,使西方陷入危机,向欧洲的劳力移民(尽管不是所有移民)销声匿迹。可上述情况却推动了亚洲的劳力移民。中东那些货币充足的石油生产国在基本建设方面需要劳力,这首先由埃及、约旦或也门那些邻国提供。但随着此种需求的增长,便要求更远地方的劳力,先是南亚国家,接着是东南亚国家。签合同的劳力移民从70年代初的年均几千人,到80年代初增长到了100万人。从那时以来,(1)随着80年代石油实际价格的下降,特别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移民数量出现了起伏;(2)移民的源地扩展了,流入的东南亚人逐渐增多,特别是菲律宾人和印尼人;(3)移民的技术结构和性别结构改变了。当海湾国家从基本建设进入持续发展阶段时,便需要更多的技术劳力,特别是掌握英语的人,这有利于菲律宾人和印度人。当本地人口激增时,又需要相应的服务,从而使非技术劳力不断涌入。例如,对家庭帮佣的需求引来大批妇女,她们来自斯里兰卡,还有来自印尼及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少女。

与迁往定居社会的移民不同,劳力移民是短期的,合同到期后便大批返回故里,尽管许多人又依新合同再度出国。流动性是这类移民机制的特征。据估计,大约有100万打工仔离开喀拉拉,这个邦1981年有2500万人口(Isaac in Zachariah and Rajan, 1997, 271)。印度前往海湾国家的移民有大约一半出自喀拉拉邦。虽然海湾战争期间将近25万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在几周内被遣返,但来自亚洲国

家的劳力移民已恢复到比80年代更大的数量,尽管如上所述其构成已发生了变化。

外部强权的介入

殖民主义对劳力移民的影响已如上述,但它对人口迁徙的作用尚不止于此。例如,前往宗主国求学的学生回国后占据要津,管理社会,具体情况将在下面论述。殖民时代建立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为后殖民时代提供了基础,对英国来说尤其如此,它已成为广大南亚国家的东道国。直到1962年《联邦移民法案》实施以前,出生在英联邦的移民都可定居在联合王国,成为其公民。但这些移民现象不能完全归因于殖民时期的纽带。关键原因还有繁荣时期英国对劳力的需求,以及为补偿战后的艰苦生活而对餐饮的“异域”口味的需求。英国可以利用殖民时代建立的各种关系,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各国则使用外籍劳工以满足对劳力的需求。1962年后,英联邦的公民很难进入英国了。就在那些移民定居社会着手向非欧洲移民打开大门的时候,联合王国却企图向新移民关闭大门,但偏偏在此之后,流入联合王国的亚洲移民却进入高峰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部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主要来自美国,它首先卷入朝鲜半岛的战争,随后介入越南战争。美国在日本、韩国、泰国以及后来在南越驻扎大批军队,为后来的移民埋下了伏笔。据估计,每九个美国士兵回国时会带有一个带回其韩国妻子(Kuznets, 1987),而这又为日后家庭团聚建立了基石。所有这些国家都对目前流入美国的移民潮作用甚大,但它们都不能与一度是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相提并论。菲律宾的英语基础教育和1992年以前在苏比克湾和克拉克庞大的美军基地,使它成为一个亚洲典型的移民外流国

家。目前,每年超过6万人进入美国。1996年底,约650万菲律宾人生活在海外,而那时该国共计约有7000万人口,也就是说,每11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是跨国移民。在这650万人中,有270万是到中东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合同工,有190万是定居者,主要是去美国。其余的估计是非正式的移民,主要散布在其他亚洲国家。

可是,外部强权的介入并不必然导致寻求定居的移民潮。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以及随后阿富汗各派的内斗造成了成千上万难民涌入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值得注意的是,50年前的亚洲是一块逃难者的大陆。印度次大陆分治,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以及后来的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都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到90年代,除了上面提到的阿富汗周边区域、缅甸周围的几个孤立地区以及印度和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麓地区之外,难民在亚洲已不复存在。促成这种变化的主要是下面一节讲述的开发过程。当然,没有理由沾沾自喜,或者信奉进步与理性的目的论。1999年中期的东蒂汶事件悲剧性地说明,难民很容易再度成为东亚移民问题的焦点。

亚洲的经济发展

截至1997年中期,“亚洲奇迹”中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经历了迄今最持久的经济增长。这种引人瞩目的增长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并且与上节叙述的情况密不可分。例如,面对中国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冷战政策需维系市场经济的活力,这促成了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然而,结果是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改观,其达到的发展水平与那些西方国家旗鼓相当。这种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出生率急剧下降,致使上述创造奇迹的经

济体以及日本,没有一个能维持人口平衡。结果是劳力增长逐渐趋缓。

这样,正当亚洲各国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降低之时,它们在移民问题上也经历了从劳力过剩到劳力短缺的变迁(参见 the essays in Abella, 1994)。在劳力过剩阶段是人员外流,而随着经济进入劳力短缺时期,则面临移民入境的压力。转型过程通常比从人口输出到输入的转型要复杂得多,但尽管如此,这种有关移民状况转型的观点仍抓住了深层的人口和经济演变过程。在亚洲,正是这些演变过程使迁入移民成为最近20年的主要问题。

出生率下降的影响必须同当地人教育水平及其对生活预期的提高联系起来看。低技术劳力严重短缺,因为当地人不愿从事危险的或又脏又累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实际上除了枯燥乏味,报酬并不低,也并非那么不安全。由于需要输入工人去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那些烦人的工作,东南亚的移民已从海湾国家转向了亚洲国家。例如,1980年,泰国和菲律宾的海外合同工分别有97%和84%前往中东,只有3%和11%进入其他亚洲国家。到1994年,这两个国家的工人有89%和36%前往亚洲目的地,其中泰国人主要是去中国台湾(数据引自Hugo, 1998)。孟加拉国到中东去的移民打工仔在1992年和1993年有17万人以上,到1996年已下降到13万多人,而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人数则从1991年的几千人上升到将近7.2万(Mahmood in Appleyard, 1998, 179—180)。

一般讲,外籍劳工在亚洲国家只占国内总劳力的很小一部分。在南亚国家是微不足道的,其国内人口大量流入孟买、加尔各答、新德里、班加罗尔或卡拉奇,以满足那里对劳力的需求。在东亚和东南亚,保守的估计有660万外国移民。在东亚、尽

管在日本的绝对量很高,但仅占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劳力的1%和2%。然而在东南亚,移民的影响却非同小可。尽管泰国只有4%的外籍劳工,但马来西亚有20%。新加坡总人口只有370万,但27%的劳力是外籍工人③。

因此,亚洲内部的人口流动瞄准的是东亚和东南亚最发达的经济体,这已成为90年代移民的主要趋势——在此时期,东南亚、南亚和东亚之间的移民网络逐渐形成。另外,以前去中东的移民和后来去亚洲目的地的移民之间也存在联系。原来远距离流动的移民返乡之后,便聚积起来,随时准备前往新出现的目的地,同时也以其海外打工的经历为别人做了示范。到中东和东亚国家去的劳力移民主要是通过劳务公司来管理的。

同时,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需要大批技术劳力,而当地的技术劳力不是尚未形成,就是供不应求。这些人主要通过亚洲跨国公司的网络流动,其中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及新加坡的跨国公司正日益同西方公司相抗衡。西方公司本身也逐渐依靠亚洲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以打入亚洲市场。这些高技术移民集中在亚洲的“全球性都市”,如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孟买这些重要的金融中心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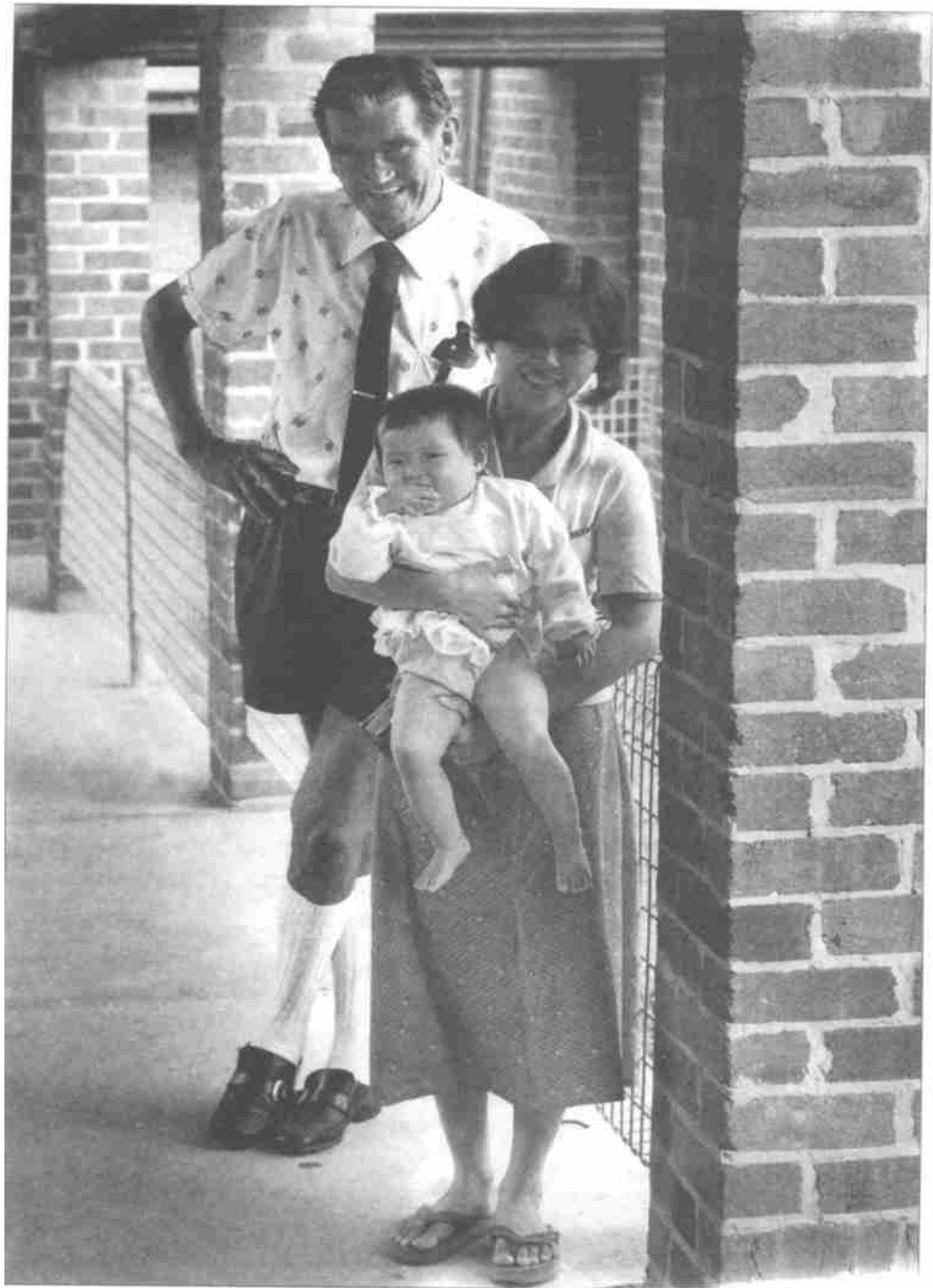
移民在亚洲的各种后果

亚洲内部和出自亚洲的上述人口流动意义深远;它们涉及方方面面,对源出地和目的地都有影响。像其他地方的移民一样,那些离境或被征召离境的人们在其故乡并不是最穷的,他们有一定资本,这种资本或者是资金,或者是良好教育、技术及创业精神。他们离开祖国被视为一种“人才流失”,这种损失必须依据他们本来在国内

能否找到发挥其才能的工作来衡量,最关键的是,必须依据他们给家里汇款的多少来衡量。至少在东亚,没有证据表明人才离境导致了生产率或生产下降。从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到海外去的学生数量上升的同时,这些经济体恰好进入持久的增长期。开始,很少有学生回国。甚至在大量人口外流的当地农村,也没有证据表明乡村生产因移民离境而受到负面影响。

汇款和经济变化

在评估移民对经济的影响时,汇款总是占据首位。1990年,全球有案可稽的汇款共计710亿美元,仅次于国际贸易中的石油收入(Russell, 1992)。“有案可稽”大大低估了汇款的真实数字,因为很多汇款是经过非正式渠道寄送的。例如在喀拉拉,据估计通过非正式渠道寄回的汇款超过60%(Isaac in Zachariah and Rajan, 1997, 286)。在巴基斯坦,80年代中期有案可稽的汇款几乎占GDP的9%,在那10年里大抵每年都超过20亿美元。1996年,海外菲律宾人寄回了42亿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的汇款寄自美国(据菲律宾中央银行未出版的资料)。至少从正式渠道看,定居海外的菲律宾人对菲律宾经济的贡献更大。而印度出国合同工的汇款则比海外定居者要多,1990年,按人均计算,寄自海湾地区的有980美元,寄自美国的有654美元,寄自联合王国的有288美元(Isaac in Zachariah and Rajan, 1997, 286)。同一年,有10亿多美元从海湾寄回印度。所以,人员流动成为赚取外汇的重要来源,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也采取这一对策从全球劳务市场上获利。1978年改革以后,中国开始向海外输出劳力,到1993年,有17.3万名工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Mofert, 1994—1995)。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 Hervé Gloaguen 摄影/ Rapho 供稿。

汇款的实际好处经常受到质疑。例如, 移民可能把收入存放在他们打工所在国家的经纪人手里, 而国内的亲属随后收到的只是等值的本国货币, 这样源出国就无法得到外汇收入。汇款寄回国, 人们可能用来购买奢侈的进口商品, 并且经常振振有词地把积攒下来的钱花在摆阔的挥霍浪费上。可是, 对现有资料的客观分析表明, “每个移民打工者都节俭度日”(Gunatilleke, 1986, 15)。尽管有“损耗”, 但对源出国, 对移民者及其家庭来说, 收益还是主要的。汇款常被用于下一代的教育, 即使用在摆阔的挥霍浪费上, 例如盖房子或婚宴, 也会刺激当地的供给和产业。

汇款在当地发挥最大影响的例子莫过于太平洋上的那些小岛国(参见 Brown and Connell, 1995)。在那里, 所谓“移民—汇款—官僚制”经济发展起来, 岛民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围绕移民及其收益展开。商品, 无论是从目标国买回来还是寄回来的, 使小市场繁荣兴旺。但这一策略几乎完全基于外来资源, 它是否能支持该地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仍有待观察。

政治和社会变化

出自亚太国家的移民有远比单纯经济方面更广阔的影响。从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向海湾国家输出的劳力主要是男性。在妇女被束缚于家庭的那些社会, 男人长期外出的影响是深刻的。女人们往往是破天荒地推到这样的位置上: 必须当家做主, 决定是否雇人干农活儿以及处理钱财。不仅为在当地使用, 而且为同海外的丈夫通信, 她们还需学会读和写。男人不在家可促使女人的角色发生变化, 甚至提高其地位(见 Gulati in Zachariah and Rajan, 1997), 尽管结果并非都是如此 (Guardner, 1995)。

移民回国不仅带回了现金和商品, 而且还有新观念和新的接人待物的方式。许多早期的亚洲革命领袖都是从法国、苏联、美国或英国回国的留学生和工人。在 1920 年代从巴黎归来的人当中, 邓小平、周恩来和胡志明是最著名的。孙逸仙是从美国回国的留学生, 又一直同在日本的留学生关系密切。李光耀这位现代新加坡之父甚至在伦敦做了一场题为“归国留学生”的演讲。今天, 东亚各“虎”的政界和商界领袖大多曾在海外受过教育, 而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政治的快速民主化与回国留学生的日益增多密切相关。1990 年代中期, 有 25 万以上的亚洲留学生就学于美国有资格授予学位的院校, 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有 6 万。那时, 在上述国家学习的留学生中, 亚洲人占了大约 60%, 其中中国人超过 5 万。一旦他们回国, 可以肯定将对其国家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亚洲移民的若干问题

上述亚洲移民种类的变化及其影响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它们既是学术性的, 也是政策性的。其中最重要的涉及主权, 还涉及冷战结束、两极结构消失后跨国社群的发展状况。

聚居区和跨国社群

“华人聚居区”或“印度人聚居区”, 顾名思义就是这些社区在其各自的国家之外。如前所述, 在中国和印度境外生活的移民及其亲属的绝对数量十分庞大。然而, 移民并不仅仅限于从源出国流向目标国, 也包括人们回国, 或者在源出国与目标国之间, 或在多个目标国之间来来往往的复杂过程。这类现象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可在出自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华人当中见到,

并一般以“宇航员现象”著称。某个家庭申请移民到某个目标国,但在到达以后,只有妻子和孩子们实际定居下来。养家的人(当然有时不是丈夫)却返回香港或台北继续其生意或职业,并定期往来于太平洋两岸之间与家人团聚。如果夫妻都回到源出地,孩子们就成了“空降子女”,字面意思即被投放到了目标国。

“宇航员”可能代表的是远距往来的极端形式,但他们却标志着跨国社群更普遍的发展趋势,亦即人们既不定居在源出国,也不定居在目标国。其他许多人在工作期结束后告老还乡,回到故国,离开已成家的子女,又定期赶来同子女团聚。他们可能坚持在两地维系一个家庭。这种两地居留模式动摇了有关领土国家及其公民生息于固定地方的传统观念。聚居区一向被认为提供了一个认同的基点,它在后现代的世界中正在消除国家的影响,使其寿终正寝,从而代替对国家的认同。

上述观点过于极端。聚居区虽非同一的共同体,但如上所述,它们往往出自极特殊的少数社群,而且常常是少数中的少数:例如韩国基督徒、锡克教徒中的贾克人、华裔马来西亚人或者中国广东人或潮州人。在有关亚洲移民的研究中,种族和次种族的问题仍被忽略。聚居区很少形成同国家抗衡的权力机构。目标国的同化过程仍在继续,特别是对于第二代以下的人们,因为到那时已经有混血通婚了。

还有,中国人和印度人在海外的社群,其财富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使他们成为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日益强大的院外集团,不仅为其海外成员的利益,而且为其祖国的利益而奔走。许多中国和印度移民在北美的 高技术部门工作,这些部门的利益冲突已经使目标国的国家安全成为问题。海外亚裔掌管的公司着手扩张的时候,常常回

到其源出国,以为目标国寻求贸易利益。源出国也设法吸引其海外社群的财富以作为外来投资。例如,在 80 年代前半期,印度所有海外投资中的大约 10% 来自境外的印度人,尽管在这 10 年的以后时期和 90 年代,这一比例下降了近一半。据估计,中国大约 80% 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海外华人资产,当然这其中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因此,虽然有些源出国有点担心放宽限制会动摇其国内政治架构,但聚居区对于源出国社会的确有巨大利益。

非法移民

可是,在有关主权事宜上,围绕跨国界问题,人们广泛关注的不是亚洲国家的担心,而是日益增长的非法或无证件移民问题。按道理不会有非法移民的准确数字,但一些国家其数字如此之高,已引起了对边界失控的恐惧。在东南亚估计有 420 万人生活在国外且没有公民权,其中一半以上是非法的。马来西亚有 140 万人,主要在东部,泰国可能至少有 70 万人(ILO, 1998)。这些移民大多来自邻国,有些人走的是年深日久的传统的迁徙路径,其他许多人则由搭客偷运进来。由于像中国台湾和日本那样的海岛边界控制起来比较容易,或者像中国香港和韩国的边界警备十分森严,非法移民在东亚北亚本来不成其问题。但在上述这几个经济体中,移民合法入境,却在其旅游、留学或其他入境签证到期后作为“延期居留者”滞留不归。1997 年底,估计有 27.5 万以上的延期居留者在日本,14.8 万人在韩国,但在中国台湾只有 6 600 多人(Watanab in AOMJ, 1998, 246; Park in APMJ, 1998, 228; Lee in APMJ, 1998, 164)。

无证件移民和非法入境者主要是这些经济体需要劳力而又没有妥善制定移民入

境政策的结果。没有一个亚洲国家自视是移民迁入国:这些国家也许需要短期劳力,但它们不是移民社会。这里存在着与1973年以前的欧洲大陆相似的情况,那时外籍工人被认为纯粹是短期现象,他们在合同期满后就会打道回府。他们连同其家庭都不会成为欧洲社会的永久定居者。可是,相似的情况也就到此为止,因为存在着重要差别。与欧洲相比,亚洲很少针对本地劳工制定有关福利社会和劳工保护的法律,更不要说针对移民打工仔了。总是劳力短缺,特别是有些工作本地工人不愿干,但又缺少合法规范人口流动的机制,二者之间的紧张产生了亚洲社会短期内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

日本人和韩国人一直利用职业培训引进劳力移民。受培训的学员完成项目后,甚至在培训期间就允许打工。日本人小心谨慎地维持其“纯种幻想”(Weiner, 1997),向海外日本人社群招募能“融入”日本社会的劳工。到1993年,大约有17.5万这类“日本人”被带到日本,主要来自秘鲁和巴西(Sellek in Weiner, 1997)。作为外籍劳工中的例外,这些日本人可以带家属,允许有3年居留权。日本遵循血统主义的公民权原则,又要求需5年获得永久居留资格,因此在需要输入劳力与要求输入的劳力全面参与日本社会之间就会产生矛盾,特别当有孩子降生在移民家庭的时候。

在亚洲,允许移民永久居留的体制不大多见。1989年7月,新加坡出台政策向香港来的25 000名技术和半技术华裔工人提供居留权,这是很少的案例之一。然而,实际上,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的发达经济体都需要短期的劳力移民,因而所有这些地区都必须在适当时期出台有关居留和移民的政策。只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开放的多元种族社会,有关的移民政策对于社会及其观念的变革具有深刻意义。目

前,种族和睦、重视少数民族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在大多数东亚精英的头脑中已不复存在。但是,对移民不做规范的办法危险更大。无所作为只能导致非法移民不断增多,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所有剥削、腐败和滥用职权的现象。

亚洲的非法移民已经超越了地区范围,而成为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主要问题。90年代初,估计每年有10万中国人偷渡到美国,其中据报道在任何时候都有成千上万人借道东南亚、拉丁美洲、东欧和独联体的各大城市。在从中国去美国的非法移民中,大约95%来自福建,尤其是来自像福建长乐这样的地区,例如,侯禹村(音译)大约80%的村民在纽约⑤浙江省温州是一个偷运中国人去欧洲的中心。斯里兰卡大约有10万人非法生活在海外,其中1万在日本,2万在意大利。

贩运人口成了大买卖,把一个人运到美国需要3万多美元。一般只预付一部分,其余经常是以劳务形式偿还,也就是移民在移居国作为债务劳工在纽约和三藩市的血汗工厂里为本族裔的商行干活。这一行当的经营是通过参与国际毒品贸易的大公司进行的。贩运妇女卖淫相当赚钱,也是地区性和全球性贩运网络的组成部分。正是违法的跨国贩运、大公司的巨额财富以及推动人口流动的 global 移民社群网络,向移居国的立法者提出了挑战。由于仅长乐地区每年就有约1亿美元的收入,所以当地官员不会有什么动力来限制这项贸易(Hood in Smith, 1997, 80)。

1997年经济危机与未来

1997年7月泰铢贬值标志着一场经济危机,实际上将所有生气勃勃的东亚和东南亚经济掷于衰退当中,尽管南亚国家、

中国和“虎”中的例外中国台湾相对未受损害。失业上升,许多受害国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驱赶外籍劳工,以使本国新近失业的劳力上岗。到头来,经济危机尽管来势汹汹,却转眼即逝,对地区移民状况没有多少影响(APMJ, 1998; Skeldon, 1999)。新近失业的国内劳力不愿填充移民劳工的岗位;移民打工的地点经常远离新失业者居住的地方;但也许最重要的是,雇用那些移民劳力的当地企业主更愿意使用没什么本地关系的劳力,这种关系本来能使人们在争取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更有实力。尽管有一些做秀式的驱赶行动,但没有资料表明亚洲的外籍劳工数量减少了,马来西亚在危机开始的几个月里还主动招募劳工。对外籍劳工的持续不断的需求(甚至在危机期间也如此)进一步证明了上述观点,即需要制定长期的安置移民的对策。

向亚洲较发达经济体的跨国移民正方兴未艾,向亚洲以外国家的移民在一定时期也不会减少。其他地区已有的移民模式可能在这里重现,即通过家庭重聚,在人际网络的基础上实现连锁式移民。该地区未来移民出境的数量既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和指标,也取决于生气勃勃的经济增长。如上所述,移民状况已经发生变化,因为一些地区已从人口净输出变为净输入,且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变化已经完成。

显然,当前的跨国移民只出自广大的亚太区域数量很小的若干地区。新出现的地区将如何与现有的网络发生联结(如果有联结的话)仍难以预料。其他地区的人们并非一潭死水;他们也许会在国内流动,经常是到那些输出跨国移民并存在着劳力短缺情况的地区去。例如,广东和福建沿海就是吸引中国内地移民的地区。一直有人设想,从福建本地迁出的移民已达到“其自然的极限”(Hood in Pan, 1998, 34),但

国内流入福建的人们是否打算或者有能力移居海外,则不得而知。中国内地的人们很少有方便其成行的海外亲属关系,他们必须通过其他华裔社群建立自己的“立足点”。

在此问题上没有什么千篇一律的模式。1904年到1907年,中国北方省份河北、山东和河南的人们大批被作为劳工运往南非,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是从山东招募了将近10万人到欧洲做后勤兵,这些人实际上全都回到故乡,没有在海外留下北方人的华人社区,这与许多从浙江出来、当时就留在了欧洲的人形成对照;但山东人并非安土重迁,他们迁徙的目标是向北到满洲,而不是海外。因此,未来亚洲移民的确切动向是难以预料的。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亚洲各地经济将继续不平衡地发展,由此产生引发移民的差距。一些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约束、面积、政治状况或者这些因素的某种合力,将永远无法持续发展,只能向国内或国外提供劳力。一些地区的“荒漠化”并非不可想像,它们不仅包括那些太平洋小岛国(Ward, 1989),而且包括遍及亚洲地区的边陲地带,那里的移民已经使该地保持人口再生产的能力趋于枯竭。同样明显的是,亚洲其他地区在达到与西方相同的发达水平的时候,只有依靠输入移民才能保持其发展水平及其人口。作为本地区不平衡发展的结果,移民将在一些地方导致多元族裔的社会,而在另一些地方导致人口下降。还有一些地方,从源出国向目标国以及各目标国之间的跨国迁徙将促成遍及全地区甚至全球的社群。就此而论,跨国移民将成为21世纪亚洲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最有力的动因之一。

〔祝东力译〕

注 释

1. 有关海外华人的文献十分丰富。对海外华人数量的估计, 见波斯顿、毛、余等人的研究 (Poston, Mao and Yu, 1994; Pan, 1998)。综合性的基础研究参见席恩的著作(Sinn, 1998)。
2. 这方面也有大量文献, 虽然综合性的“大部头”著作不像有关海外华人的那样引人瞩目。例如, 近来没有论著能赶得上廷克尔那经历了时间考验的著作(Tinker, 1977), 当然克拉克、皮彻和维尔托维奇(Clark, Peach, and Vertovec, 1990)的论著, 布朗和福德的多篇论文(Brown and Foot, 1998) 以及近来阿波亚德文章中估算出来的数据(Appleyard, 1998) 也可参考。
3. 很少有关于亚洲国家人口输入和输出的完全可靠的数据。估计的数字经常变化, 这既反映了实际状况, 也反映了搜集资料的手段在改善, 还反映了对该问题的不同政治姿态。情况十分复杂, 因为许多移民——有时是大多数——是非法的或无证件的移民。关于亚洲移民迄今有两个重要的资料来源, 也是本文使用的许多数据的出处。《亚洲移民新闻》由菲律宾奎松城斯卡拉布里尼移民中心每月出版两期, 《移民新闻》月刊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 出版。两本刊物都有电子版: smc@mnl.sequel.net 和 migrant@primal.ucdavis.edu
4. 高技能人口的跨国流动是全球性的, 而非仅仅地区性的。亚洲的高技能移民的资料较少, 目前可参看芬德雷等人(Findlay et al., 1996) 和加尼尔(Guarnier, 1996) 的研究。
5.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 很难掌握人口偷渡的情况。胡德(见于 Pan, 1998) 的多项研究提供了有关中国人的珍贵资料, 还有史密斯(Smith, 1997) 的论文做了更全面的描述。古纳蒂勒克(见于 Appleyard, 1998) 则对斯里兰卡的非法移民做了有价值的讨论。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BELLA, M. I. (ed.), 1994. 'Turning points in labor migratio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3: special issue.
- BALLARD, R.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igration: Pakistan, Britain and the Middle East', in J. Eades (ed.), *Migrants, Workers, and the Social Order*. London: Tavistock, pp. 17-41.
- BROWN, J. M. and FOOT, R. 1994. *Migration: The Asian Experience*. London: Macmillan
- BROWN, R. P. C. and CONNELL, J. (eds.), 1995.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in the South Pacific',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4: special issue.
- CLARKE, C., PEACH, C. and VERTOVEC, S. (eds.), 1990. *South Asians Overseas: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NDLAY, A. M., LI, F. L. N., JOWETT, A. J. and SKELDON, R. 1996. 'Skill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 a study of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 *Tran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21: 49-61.
- GARDNER, K. 1995. *Global Migrants, Local Lives: Travel and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Banglade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ARNIER, P. 1996.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a growing trend among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5: 367-397.
- GUNATILLEKE, G. (ed.), 1986. 'Introduction' in G. Gunatilleke (ed.), *Migration of Asian Workers to the Arab World*.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p. 1-22.
- APMJ, 1998.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on migration in A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7: special issue.
- HUGO, G. 1998. 'Migration and mobilization in Asia: an overview', in A. Laquian, E. Laquian and T. McGee (eds.), *The Silent Debate: Asian Immigration and Racism in Canada*. Vancouver: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p. 157-192.
- ILO, 1998.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echnical report for discussion at the High-level Tripartite Meeting on Social Responses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angkok,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2-24 April.
- KUZNETS, P. W. 1987. 'Koreans in America: recent migration from South Korea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S. Klein (ed.), *The Economics of Mass Migr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Paragon, pp. 41-69.
- MOFERT 1994-5. *Almanac of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rade*. Beijing: Ministry of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rade.
- PAN, L. (ed.) 1998.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 POSTON, D. L., MAO, X. and YU, M.-Y. 1994.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round 199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 631-645.
- RALLU, J.-L., BEDFORD, D., SODTER, F. and BAUCHON, G. 1997. *Population, Migration et Développement dans le Pacifique Sud*. Paris: UNESCO.
- APPLEYARD, R. (ed.) 1998. *Emigration Dyna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ume II: South Asia*. Aldershot: Ashgate.
- RUSSELL, S. S. 1992. 'Remittances fro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i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4: 267-287.
- SINN, E. 1998.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SKELDON, R. 1997.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Longman.
- SKELDON, R. 1999. 'Migration in Asia after the economic crisis: patterns and issues',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14: 3-24.
- SMITH, P. J. 1997. *Human Smuggling: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s Immigration Tradition*. Washingt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TINKER, H. 1974. *A New System of Slavery: The Export of Indian Labour Overseas 1830-192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NKER, H. 1977. *The Banyan Tree: Overseas Emigrants from India,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RD, R. G. 1989. 'Earth's empty quarter? The Pacific islands in a Pacific centu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55: 235-246.
- WEINER, M. 1997. *Japan's Minorities: The Illusion of Homogeneity*. London: Routledge.
- ZACHARIAH, K. C. and RAJAN, S. I. 1997. *Keral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New Delhi: Sage.

三种巨大的、出乎意料的移民运动出现在该地区:第一种,在该地区内部前所未有的跨国人口流动;第二种,地区外人员入境;第三种,过境前往西方的过境移民。这三种现象对正经历移民潮的这些国家有着直接的、有时是重大的影响,激发了它们政治上的特殊反应。

〔祝东力译〕

独联体近期移民趋势

詹娜·扎扬柯夫斯基娅

本文根据官方统计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考察了前苏联在90年代初解体之后独联体(CIS)移民模式的变化,并且分析了造成这些变化的种种因素。本文内容不仅包括独联体各国之间的迁移,而且包括它们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迁移。本文特别关注俄罗斯族和其他族群的回归、难民和流民的被迫迁移、劳工移民流、非常规移民,以及被逐民族的回归等等。

〔李存山译〕

从土耳其的过境移民

看国际移民体制的政治学

阿赫梅特·伊斯杜伊古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移民一直是西欧国家与土耳其的关系的显著问题。80年代和90年代,过境移民和难民庇护成为主要的迁移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争论的热点。本文以此为背景,对土耳其境内的过境移民和难民群进行了考察,对土耳其与欧洲之间形成迁移、庇护和难民体制的更广阔的背景进行了评价,并将过境移民问题同正在发展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本文还对过境移民与国际移民政治的联系进行了探讨,为此而认真考察了国

际移民体制的政治方面。“体制”一词可宽泛地解释为一定利益运作并能够分配权力和利弊的一种规范系统。文章认为,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已经对国际移民活动在一种国际规范系统内的扩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张大川译〕

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

罗纳德·斯凯尔顿

本文在叙述了古代亚太地区的人口流动现象后,主要关注近半个世纪的移民状况。移民的原因被归结为四种:目标国的移民入境政策;外部强权的干预;中东的发展;以及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自身的经济开发。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讨论了最近以来人口流动的主要影响。当前,亚洲移民的问题主要是全球化时代的主权受到挑战以及跨国社群的出现,还有非法移民也是亚洲政府特别关心的问题。情况表明,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经济衰退对该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甚微,跨国移民将继续成为亚太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因之一。

〔祝东力译〕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问题

及最新趋势

阿得兰提·阿得泊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迁移具有多种形态,最常见的是地区内迁移,这些移民包括移民工人、非法移民、游牧民、边境工人、难民和高技能专业人员。由于该地区社会一经济和政治局势的恶化,迁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非正常迁移增加、迁移路线多样化,移民中出现贩卖人口的现象。男性的迁移有选择且得到资助,女性自主迁